

# 擺脫孤立之路：日俄戰爭後 清政府的聯盟外交實踐

● 林曉萍

**摘要：**日俄戰爭之後，清政府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在此段歷史時期，日本通過鞏固日英同盟關係，並與法國、俄國、美國相繼締結互相承認在華勢力的協約，逐步形成了對華外交包圍。在此外交困局中，清政府開始再次認真思考聯盟外交政策，尋求擺脫日益孤立的不利處境。本文考察清政府兩次積極嘗試推動締結中德美聯盟，希望藉此突破日本與列強的外交包圍，第一次聯盟以袁世凱為主要推動者，第二次的主角則是攝政王載灃。清政府內部雖然已經開始熱議各種聯盟政策的可能性，但最終決心推行聯盟政策的事件節點往往受到列強行動的影響。清政府的聯盟實踐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還是展現了當政者嘗試打破外交包圍的努力，亦呈現了晚清外交的真實困境所在。

**關鍵詞：**聯盟外交 中德美聯盟 袁世凱 載灃 日俄戰爭

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的發生，不僅給淪為戰場的中國東北地區帶來了沉重的災難，而且劇烈地改變了東亞的國際關係格局，身在局中的清政府也不得不隨之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並產生與列強建立聯盟的外交意識。早在日俄戰爭以前，歐洲列強或締結兩國同盟，或有三國同盟，以「合縱連橫」保護與擴張自己的利益。當時連日本也意識到置身事外已非上策，希望與英國締結同盟<sup>①</sup>。選擇同盟、締結盟約成為各國在此一歷史時期的重要外交課題。

關於清王朝末期的聯盟外交問題，既有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成果積累。不少研究者將研究重心放在清政府的聯盟實踐，即清政府與擬聯盟對象國的具體交涉情況上，卻相對忽視了清政府內部從逐漸形成聯盟認識到決心進行聯盟嘗試的過程<sup>②</sup>。同時，大多數的研究主要分別考察清政府後期的兩次聯盟嘗試，忽視了攝政王載灃對繼承袁世凱外交政策遲疑不決的轉折時期，

從而不利於系統考察日俄戰爭後到清朝覆滅前清政府聯盟認識全貌<sup>③</sup>。此外，清王朝末期的聯盟政策形成還與東北問題、美國對華政策以及日俄戰後的日本外交有着密切關聯，相關研究也有利於進一步探討清政府的聯盟問題<sup>④</sup>。

自日俄戰爭結束到清朝覆滅，為了擺脫外交孤立，清政府先後實行了兩次中德美聯盟實踐。本文擬對清政府在日俄戰爭結束後的聯盟認識為切入點，考察「聯俄制日」等外交實踐失敗後清廷如何認識聯盟政策，包括內部有哪些聲音、各種聲音有何不同，以及最終由誰來推動政府做出聯盟嘗試。

## 一 《日法協約》簽訂引發的聯盟問題討論

1896年簽訂的《中俄密約》不但未能制衡日本，反而因為中國向俄國出讓東北利益，導致東北成為日俄兩國交戰的戰場。雖然日俄戰爭結束之初，諸如駐英公使汪大燮以及協助地方官員興辦實業的熊希齡等極力主張與列強結成聯盟，但尚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視<sup>⑤</sup>。此外，日俄戰爭之後，對於日本政府流露出的聯合中國意向，清政府並未予以回應，如時任商部商務司主事曹汝霖所憶述：「我聽了小村〔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之言，知必係日本政府與我有提攜之意，其時中日親善確有可能。……其後南滿鐵路會社，開設高等工業學校，日使照會外部〔清廷外務部〕，特留學額五十名，希望中國派學生入學學習，外部亦置之不理，可見當局之顛頂矣。」<sup>⑥</sup>。這體現出「聯俄制日」等外交實踐失敗之後，清政府對於聯盟問題態度趨於消極。清政府正式開始認真考慮聯盟問題可能是在《日法協約》簽訂後。

早在1907年2月14日，吉林將軍達桂便致電軍機處、外務部，表達了「諸鄰責言，必謂我真不足以自立，一變其和平之方針，協定特別條款，大局何堪設想」的擔憂<sup>⑦</sup>，其中達桂所言「一變其和平之方針，協定特別條款，大局何堪設想」，果然一語成讖。6月，駐法公使劉式訓匯報日本與法國欲就東亞問題達成協約<sup>⑧</sup>；10日《日法協約》公布，兩國約定的互保領土中竟包括中國領地，劉式訓認為「似有干涉我邊務之意」<sup>⑨</sup>。隨後各國結盟的情況愈演愈烈，到了7月《日俄協約》、8月《英俄協約》等相繼訂立，駐比利時公使李盛鐸感歎道，當時已形成了「是我與彼等互相箝制既辦不到，而各國合而謀我」之危險局勢<sup>⑩</sup>。

1907年是日俄戰爭之後東亞外交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英國是第一個與日本建交的國家，曾在軍事、實業等方面支援明治維新；傳統上兩國關係匪淺，早在1902年便締結《日英同盟》，以防日俄爭奪的東北局勢產生變化。1907年初，英俄開始接近，日俄亦開始洽談戰後合作關係。隨着日俄關係緩和，日本亦能在與俄國關係密切的同盟國法國順利發行公債，為日法接近創造了條件，遂有《日法協約》簽訂<sup>⑪</sup>。協約聲稱為了兩國和睦，兩國除了尊重中國的獨立完整與所有國家在華的貿易待遇均等原則之外，「並且特別關心在鄰近它們擁有主權、保護權和佔領權的領土的中華帝國地區內的事物

處於有秩序和和平的狀態獲得特別的保證，現約定相互給予支持以確保這些地區的和平和安全，目的在於保持締約雙方在亞洲大陸的各自的地位和領土權利」<sup>⑫</sup>。

對於《日法協約》簽訂，清末報人汪康年在《京報》社評中指出，當初《日英同盟》簽訂後日俄戰爭爆發，可見「天下固無虛立之協約也」；自從聽聞英俄將立協約，汪康年已經頗為惶恐，擔憂繼此之後會有數個協約出現，而且影響會超過《日英同盟》，果然《日法協約》訂立。這令汪康年感到大為憂慮，其感歎道「今者日法協約則既成矣，吾聞之以為大戚，一若大災巨患之將集於目前，且以為政府之戚，必大過於吾也。已而察政府意，殊淡漠視之，不若黨人匪亂之為慮甚也」，並痛責清政府「大昏憒」<sup>⑬</sup>。清政府是否如汪康年所責，已經到了昏聩不知危險將至的地步？從外交史料來看，清廷對《日法協約》之簽訂感到十分擔憂與憤怒。7月29日，清政府發電北洋大臣袁世凱、南洋大臣端方、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罵日法兩國「侵我主權、逼人太甚」<sup>⑭</sup>。隨後又發生了韓國國王為日本威脅退位之事，也加深了清政府，尤其是東三省督撫對東北局勢的恐慌<sup>⑮</sup>。

8月14日，時任兩江總督端方為應對《日法協約》簽訂，提出了涉及內政、外交的數條重要建議。外交方面，端方的建議是「又我如能派親貴重臣遊歷歐美，密與德美兩國設立協約，以互換利益為主，尤足為無形之抵制」；「蓋德在歐西，方處孤立，為遽與日本聯合。美與日正在互相猜忌，默察彼情，此時似尚可與協商」。鑒於情況瞬息萬變，端方請朝廷早日決斷，認為應對《日法協約》危機，在聯盟方面應採取聯合德美之策<sup>⑯</sup>。從端方的建議內容來看，應是由其幕僚鄭孝胥所草擬。8月3日《鄭孝胥日記》載：「擬覆外部預備日、法協約辦法五條：一，選派親王遊歷歐美，密與英、德、美設立互換利益之協約；一，雲南、廣西、廣東、福建四省急辦地方自治，限二年成立；一，急辦福建通粵、雲南通蜀之鐵路；一，福建船政易地另建；聘用英國工匠；一，雲南礦務招商自辦。」事實上，端方並非僅此一次委託鄭孝胥草擬應對《日法協約》方案，1908年2月28日《鄭孝胥日記》載：「午帥屬擬密摺，言日法協約事。」<sup>⑰</sup>但兩人分歧亦從中可見。端方僅主張聯合德美，而鄭孝胥則主張同時聯合英、德、美，之後一直十分重視聯英。

早在1906年秋，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便向中方傳達了締結中德美聯盟的意向，但中國並無反應，直至《日法協約》、《日俄協約》等相繼訂立，始有所警惕。1908年1月12日，德國外務部再次提及中德美聯合事宜。駐德公使孫寶琦回覆「我誠願親睦德美，但勢力懸殊，難為兩國之助」，德方則表示「並非聯盟，但三國表明和好之據，以為聲援」。孫寶琦認為「查德美交固，今願同我合，從較之英法日協約定後，尚屬視我為平等之國，似無惡意」，於是向外務部乞示如何應對。孫寶琦還商請駐美公使伍廷芳探詢美國政府意見，言下之意頗為重視中德美聯盟。25日，孫寶琦從德國外務部得知，中國已派人赴美商議聯合之事<sup>⑱</sup>。

8月22日，駐法公使劉式訓電軍機處，「港報主李心靈在此倡聯美政策，美報響應多贊成，商界尤歡迎。竊維今日局勢，我難孤立」<sup>⑲</sup>。日本亦注意到

在香港首倡美清同盟的人物、香港《華字日報》主筆李心靈的活動，駐港副領事船津辰一郎向日本國內匯報了李心靈的生平經歷<sup>20</sup>。劉式訓認為「聯美固足使日本斂迹，似宜同時另結德好，以掣法肘，藉破法日協約之能力」<sup>21</sup>，不僅提出了聯合德美的主張，其中還有明確的約束日法意識。

兩廣總督張人駿對聯盟問題則有不同意見，8月27日電軍機處，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認為「美國與我素敦和好。此次慨還庚子賠款，我國專使往謝，彼都歡迎之聲喧傳遠近。邦交之篤，尤非他國可比。近閱各報多以中美聯盟，為今日外交要着。有人自巴黎來電，謂聯盟之舉，美洲全國贊成。昨紐約報館訪事端那路來謁晤談之際，亦以此為言，並云曾告諸秩庸〔伍廷芳〕星使，參觀互證」。張人駿指出僅宜聯美，有四個理由<sup>22</sup>：

美人已佔飛〔菲〕律賓，與台灣只隔海程二日，且願與中國聯合，正以自為。而中國得此，則日本與法、德皆有所疑畏而可戢其野心，一也。

日本初起，止求中國視與歐美平等。當時以國小未允其請，彼乃發憤為雄，遂成今日大害。今美既有與我聯合之意，正宜因勢利導，免致失機，二也。

聯美與聯俄形勢不同，得失迥異。俄與我壤地相接，無他國間之。飛律賓究隔一海，我之沿海各埠皆已通商，有各國與之相持，無從肆其侵佔之謀，三也。

今日列強最重均勢，英據香港、法踞廣灣、德踞膠島、日本則隔一衣帶水，俄則境土毗連，獨美國所處僻遠，而在中國商務最盛。近雖略古巴取呂宋，然較其勢力究未能與各國平均。彼為保商計，豈能不竭力維持，甘居人後。今我與之聯合，則彼心安而不復再生覬覦，四也。

基於此，張人駿力勸清廷採取聯美外交政策。但是不同於端方、孫寶琦與劉式訓的聯合德美主張，鄭孝胥主張的聯合英、德、美三國的建議，張人駿僅積極建議聯美。這些地方官員和外交官員的建議對清廷形成「遠交近攻」的認識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 二 清廷「遠交近攻」外交政策的出台

從現有史料來看，光緒晚期清政府政要以外務部的慶親王奕劻、那桐和北洋大臣袁世凱為中心，加上徐世昌、唐紹儀、陳昭常等人，明確地推動「遠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多指向「聯美制日」，且不排除存在「聯德美制日」的期待。

袁世凱其實對美國一直頗有好感，亦清晰地認識到美國對東北局勢的影響力。在1905年美國排華問題上以及處理東北問題時，袁世凱便採取了親美立場<sup>23</sup>。1908年袁世凱接受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記者米拉德(Thomas F. Millard)的採訪，在談及中美關係問題時，袁世凱指出美國

「一直是大清國的朋友」，「如果說在不遠的將來，大清國在關係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峻時刻必須挺身抗爭的話，我們會期待並信賴美國能夠為保護我們的權利而在國際上善施影響。當然我們會對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強國家抱有同樣希望，然而我們更加信任美國」<sup>24</sup>。辛亥革命後袁世凱主政，在1912年7月21日於總統府招待全體參議員的茶話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當時的外交情形已經與之前有所不同：1911年爆發的意土戰爭不容易和平解決，這將英、德、法等國家的視線吸引到西方事務，或許將無暇顧及東方；日俄或許會趁此機會，合力同謀，因此「昔日之外交政策主遠交，今日豈口形勢既變，不得不改為近交」<sup>25</sup>。

從1912年的演說可知，袁世凱有意在民國肇立之際，改「遠交」為「近交」。那麼，袁世凱在何時曾力主過「遠交」？查閱史料可知，1913年初袁世凱曾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等談論外交結盟事宜，自述1908年曾力主聯美：「聯盟一節，固為國際上至要問題。在五年前，予曾極力主張，不幸未能成立。惟目下時期，恐尚不敢存此希望。因現在應先求列強之正式承認，其聯盟各手續，只可預行籌備以俟將來可也。」<sup>26</sup>

早在日俄戰爭後盛京將軍趙爾巽奉命督東（東三省）時，便對美國駐牛莊總領事薩蒙斯（Thomas Sammons）和駐奉天總領事司戴德（Willard D. Straight）等流露出親近態度<sup>27</sup>。而趙爾巽在向清廷匯報東北情況的奏摺有云：「迭蒙訓示，指授機宜，備極周詳，奴才得所遵守。起程出京，取道天津晤商北洋大臣袁世凱，籌議一切，旋復就道。」<sup>28</sup>可見趙爾巽的親美態度與袁世凱不無相關。

袁世凱與後來擔任東三省督撫的徐世昌、唐紹儀關係之密切更是人盡皆知。1907年徐世昌補授東三省總督之後，其在5月4日日記中亦有載：「黎明起，赴津訪慰帥〔袁世凱〕，商議撥兵赴東三省暨外交各事，留二日。」<sup>29</sup>1908年7月20日，清政府派遣奉天巡撫唐紹儀作為專使赴美，感謝美國歸還庚子賠償餘款，並作為考察財政大臣，赴日本及歐洲諸大國了解各國財政情況<sup>30</sup>。藉此機會，唐紹儀積極展開了聯合德美的外交計劃。而在第三者日本的眼中，唐紹儀赴美旨在推進「清美同盟」計劃<sup>31</sup>。筆者尚未查得直接史料，證明唐紹儀有「聯美制日」的明確想法，但從下面幾則《上海圖書館藏唐紹儀中文檔案》（下稱「唐中文檔」）資料，可以間接證明其有相關思考：

其一，1907年山東候補道劉元祺、湖北候補道胡俊采等十人聯名，向唐紹儀上陳了如何在東北抵制日本殖民政策的辦法等。從上述陳文來看，即使地方官吏亦知曉和英美合作修築的新法（新民屯—法庫門）鐵路，其目的便是要制日<sup>32</sup>。

其二，1908年一名地方官吏向唐紹儀遞交其對外交交涉的看法，建議採取「遠交近攻」之策應對強鄰，並提出「聯美制日」：「惟德與美，近方睦我，尚可聯合。然德自佔領膠州以來，亦曾踞我土地，即不翅近在肘腋。萬一訂盟要素，後禍與聯俄等。且德無志太平洋權利，非日本所最忌者。必欲得一強國以制日本，其惟聯美乎。」<sup>33</sup>

其三，1910年德國原殖民部大臣訪華，表達了對華友好，似有結盟意向，並表示要訪問唐紹儀。負責接待的滬寧鐵路局總辦鍾文耀立刻致信郵傳部鐵

路總局局長梁士詒，告知聯德的可能性。而此信也收錄在唐中文檔之中，說明唐紹儀曾閱讀該信<sup>34</sup>。

從第一則史料可知，唐紹儀已知悉修築新法鐵路勢在必行；而日本駐華公使的匯報也反映了唐紹儀對日態度確實較為強硬。1908年9月24日，日本駐華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向國內匯報，指出唐紹儀在談及滿洲及其他日清交涉問題時，持日本應該反省的論調<sup>35</sup>。第二則史料至少可以確定唐紹儀知道地方官吏亦有「聯美制日」意向。透過第三則史料，則可知梁士詒等與唐紹儀過從甚密的官員，甚至德國政要也都知道唐紹儀有聯德意向，所以才會立馬想要聯繫唐紹儀。

另外，徐世昌於1908年8月下旬前往旅大視察，並與關東都督大島義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總裁中村是公等日本政要進行了交談。在此行之中，徐世昌認為日方極力提倡中日友好，頗有誠意，並提到自從前日本駐英大使小村壽太郎回到日本擔任外務大臣之後，日本對華方針似乎稍有更改，與日本進行交涉「稍順手」。徐世昌向慶親王、那桐、袁世凱建議道，當時歐洲「黃禍論」盛起，而日本力主中日和睦，遂主張「默揣時風國勢，似未可主遠交近攻之策。仍當共籌興亞保種之謀，密以圖存，急以禦侮」<sup>36</sup>。反過來思考，亦可證明當時清廷外務部有「遠交近攻」的外交政策，不過徐世昌在視察旅大之後，對是否應堅持此外交政策有所動搖。

袁世凱對清末外交政策一度有着重大影響，在袁世凱、唐紹儀等具親美傾向的官員主導下，清政府選擇了具有更多支持聲音的聯合德美政策<sup>37</sup>。同時，由於德國向中國釋出積極態度，加上當時德日對立的格局，清政府只能在「遠交」與「近交」中二擇一。駐比官員王慕陶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寫道，《日法協約》後「德人因此勢成孤立，將來為膠州事或與日本有戰，亦未可知」<sup>38</sup>。也因為《日英同盟》的存在，清廷在「遠交」的



在袁世凱等具親美傾向的官員主導下，清政府選擇了具有更多支持聲音的聯合德美政策。（資料圖片）

對象上暫時沒有考慮英國。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在東北勢力陡增，中日關係更由於中朝邊界的「間島問題」等而陷入緊張。於是，制約日本在東北的擴張是此時清政府外交行動的重要目標。可惜的是，後來因1908年11月日美達成維護各國在華「商業和工業機會均等」的《羅脫—高平協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sup>39</sup>，加上慈禧太后去世以及袁世凱被罷免，唐紹儀失去了清廷強有力的支援，第一次中德美聯盟的計劃受挫。

實際上，清廷內部也不盡然認可此時在外交上抵制日俄，尤其是日俄戰爭之後崛起的日本。張之洞在得知《日法協約》達成之後，則認為防法重於防日，且認為抵制之事尚不必「深求」<sup>40</sup>。另外，當時美國雖然關心東北的

門戶開放情況，但時任總統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認為美國與弱勢的中國結盟只會增加美國的負擔，也無意與日本作戰，而且「在東北的利益並非真正重要」<sup>④</sup>。這些障礙反映了清廷聯合德美的外交計劃，離真正實現仍有較大距離。

### 三 載灃攝政前期對聯盟的模糊態度

1908年11月14日光緒皇帝去世，慈禧在當日發布懿旨，選溥儀入承大統，成人之前由其父醇親王載灃監國，行使軍國政事。次日，慈禧去世。載灃攝政後，清廷內部迅速掀起了倒袁運動，1909年1月2日袁世凱被罷黜<sup>⑤</sup>。早在1907年，日本便十分擔憂慈禧一死，中國局勢將不可控<sup>⑥</sup>。在得知袁世凱被罷之後，時為日本首相的桂太郎在給伊藤博文的信中表示，雖然早已預料清廷會發生政變，但沒有想到會發生得這麼早。桂太郎還指出，「從袁世凱被罷免之際的情況來看，可以想像此事並未得到能成大事者的同意。之後留下來的滿人要如何成事？這是我方要慎重的要事，應予以充分注意」<sup>⑦</sup>。之後，日本駐上海領事也注意到上海輿論頗為擔憂中國當時的「文弱內閣」是否足以應對桂太郎的「強硬內閣」，且報刊言語之中頗為袁世凱感到惋惜<sup>⑧</sup>。這體現了日本對中國朝局缺乏信心。



載灃攝政之初，所擺出的對美示好只是姿態。當時清廷中樞並沒有明確的聯盟外交政策。(資料圖片)

載灃攝政之初，徐世昌即建議採取聯合歐美、制衡日俄之策，其言「我當國勢積弱之際，固不宜有所偏重，以生間隙」，但以東北局勢，「非聯合歐美不足以抵制日俄」<sup>⑨</sup>。在載灃罷黜袁世凱不久，「西報載前半月間攝政王有私函致〔美國總統〕塔虎脫，言朝廷雖去袁而外交政策無改，中國和平全視日本在東三省之舉動，中美交情最密，想必望中國之和平云云」。汪大燮判斷「此信諒必不假」<sup>⑩</sup>。1909年1月17日，駐美官員顏惠慶的日記亦有載「聽說慶親王就袁的罷免問題答覆了在京的英、美兩國公使」<sup>⑪</sup>。在此，載灃似乎擺出了要繼承袁世凱「聯美制日」外交政策的姿態。汪大燮對此則感到不以為然，堅持認為聯美不足以制日：「美亦決不能干預日本事，兩國兵力以海軍論，不過五與三之比，合陸軍言直不過五與二之比，況道路相懸乎？」況且「前之迎艦遣使，美未嘗有隻字道及，而日本則與訂協約矣」<sup>⑫</sup>。由此可見，日美《羅脫—高平協定》的簽訂，對當時清政府聯美願望產生重大衝擊。1909年初的客觀國際局勢，也促使汪大燮更加肯定僅聯美的不足，並對自己所主張的「聯日以結英美」聯盟策略更加深信不疑。

實際上，載灃所擺出的對美示好只是姿態。當時清廷中樞並沒有明確的聯盟外交政策，但相比「制日」更傾向綏靖。袁世凱被罷之後，載灃政權與日本政府重新開啟了包括間島問題在內的各項東北問題交涉，最終中方幾乎完全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在1909年9月4日於北京簽訂了《圖們江中韓邊界務條款》與《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sup>⑤</sup>。當日載灃在日記中有「中日協約成」之語<sup>⑥</sup>，可見他對此頗為重視。對於條約簽訂情況，《那桐日記》有更為詳細的記載：9月2日，「召見時面陳與日使會議延吉廳交涉事甚棘手，現經決定，請旨定奪。奉諭：即照此定，後日簽字，如此結局已為難得，斷不為浮議所搖，今日錫督、陳撫電奏可以不理，簽字後發一電旨宣示一切可也。聖明洞鑒萬里，實為欽悚」<sup>⑦</sup>。從日記記載可知，載灃擋下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吉林巡撫陳昭常的反對意見，最終才得以順利簽訂條約。正如學者張守真所認為，載灃攝政時期「清廷及外務部的東三省政策，主要在避免與日本起外交衝突，一切以和為貴」<sup>⑧</sup>。

此時各駐外使臣的聯盟建議也是眾說紛紜。1909年6月30日，駐日公使胡惟德向外務部匯報日本汲汲聯絡與國的情況，表示「亦惟歐美各國是親，與彼爭勝於壇坫。邇來中英感情稍減，似亟宜設法轉圜。凡中外交涉稍得助言只在美國，或遇有互商事件，尤宜加意維持不授人以離間之端。今者我勢太孤，國際啟合實隱關國勢盛衰」。胡惟德建議加強與英美的關係，以制衡日本<sup>⑨</sup>。而七日之後，清廷外務部又收到了另一駐外使臣的信函，述及幾乎完全不同的聯盟策略，即「聯日制俄」。駐比公使李盛鐸認為日俄雖然訂立協定，但並非彼此全無間隙，建議清廷「不妨稍與日本圓活，俾其去俄即我之手腕靈妙，實為良策」。李盛鐸還表示，近來有消息指出，俄國陸軍大臣等有在遠東增加軍備的打算，只是受到議院中自由黨的強力反對、巴爾幹紛爭方興未艾等原因才暫時作罷。李盛鐸更擔憂俄國終有一日尋釁中國，認為俄國對於中國的威脅超過日本，故有此建議<sup>⑩</sup>。

10月28日，駐意大利公使錢恂則表示由於日俄戰爭之後「黃禍論」盛行，歐美甚重同種與不同種之別，因此建議「我國亦於同種上，再三加意，勿以鬩牆而致忘禦侮」。錢恂分析地緣政治上日本與德美兩國的關係，在黃白種族論之下，「將來日本面受太平洋美國之前衝，背受膠州灣德國之勁敵，正未知如何立國」，故而「言之深為黃種寒心，不禁起同種相扶之念」。就此，或許會以為錢恂與汪大燮一樣主張聯日，但錢恂話鋒一轉，又言觀察此時西方各國對東方政策，莫不是兩大要事：興學與借款。而從興學問題上看，日美兩國雖為鄰近國邦，美國卻阻礙日本兒童進入美國學校，相反德國與美國人卻助中國興學，「何厚我而愛我耶？其故可深長思矣」<sup>⑪</sup>。其意既強調聯合德美的重要性，又暗示聯日的可能性。然而，從國際局勢觀之，日德、日美皆有對立衝突之處，那麼採取既聯合日本、又與德美聯絡的外交政策是否可行，又是否有自相矛盾之處？

不同於清廷中樞之迷茫不定，東三省則堅持徐世昌任總督以來的「遠交近攻」政策。袁世凱被罷後，徐世昌不安於位，隨後載灃將其內調，改任郵傳部尚書，但這並沒有改變東北督撫治東根本策略<sup>⑫</sup>。錫良到達奉天之後，與徐

世昌有過「一再熟籌」以求東北維持中立之策，並自信可得徐世昌支持<sup>⑤</sup>。而陳昭常得到錫良支持，繼續踐行開發東北實業、修築平行鐵路以抵制日俄，開通圖們江海口等事宜，並就此寫信尋求外務部尚書梁敦彥的支持<sup>⑥</sup>。1909年5月9日錫良上奏，對徐世昌「開銀行、修鐵路、開放商埠、興辦實業、廣開屯墾、籌邊馭蒙」諸定策表示贊同，還明言中國想要從日俄兩強手中守住東北，最緊要的問題是缺乏財政，而此問題並不是邊疆大吏所能籌謀，還需要依賴「樞部之協謀」<sup>⑦</sup>。不同於徐世昌、唐紹儀督東時期得到慶親王和袁世凱的支持，錫良等繼任官員恰恰缺乏清廷中樞的有力支持。

徐世昌時期謀求修築新法鐵路抵制日本，後因為日本堅決反對，建議改築錦瑗（錦州—瑗瑗）鐵路，以達目的。中日為此多次交涉往來、口腔舌戰。錫良到任之後，積極推行以往徐世昌等人之治東策略，上奏開設銀行、修築錦瑗鐵路等事宜<sup>⑧</sup>。時任黑龍江巡撫周樹模亦致函外務部，從制約俄國勢力擴張的角度，奏請修築錦瑗鐵路<sup>⑨</sup>。但是清廷中樞的態度較之袁世凱時期轉為冷淡，導致錫良不得不以請求「開缺」（去職）為挾，以望獲得中樞支持。9月6日錫良上奏，以舊病復發請求開缺，表示「欲為整頓三省、抵制外人之計，仍不外將徐世昌所籌各事，賡續辦理」，但度支部反駁設立銀行計劃，又詰問路款問題，以致諸事拖延未定；其後日本又趁機以錦瑗鐵路為南滿鐵路並行線為由加以反對，外務部電飭從緩；且間島問題雖然解決，卻以允許日本修築吉會（吉林—會寧）鐵路為代價。錫良痛陳到東三月，而時局變遷使得東北已陷入「首尾受敵」之境<sup>⑩</sup>。朝廷勉勵並要求錫良留任，並着其詳細具奏。

到了10月，錫良苦於朝廷久拖不決，斷然與時任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私自簽訂《錦瑗鐵路草合同》<sup>⑪</sup>。對此貿然之舉，外務部、度支部與郵傳部三部認為合同草案「均侵損利權」，建議作廢<sup>⑫</sup>。但朝廷並沒有完全否決錫良之議，而是命令錫良與三部繼續妥商。12月12日，錫良在〈密陳借款修築錦瑗鐵路片〉中明確闡明招引英美公司貸款修築錦瑗鐵路，表面雖為一般性鐵路，其實為政治外交之策，因「是借款者，乃兼借其勢力，彼以勢力換我利權，我即借其勢力以鞏疆圉」。錫良還表示，司戴德亦了解中方此次借款，並不在於經濟利益，而在於引進英美資本以求「勢力始均，然後能與日、俄相抗，而東三省亦即藉以自存」<sup>⑬</sup>。

當時錫良為了爭取三部支持合同草案，特派與度支部尚書載澤關係密切的熊希齡上京游說<sup>⑭</sup>。據熊希齡電錫良等的內容來看，起初載澤對合同草案並「無異說」，但隔日由於度支部左右侍郎力主東三省必須有償還把握，才能允許借款，載澤便頗為動搖。久任職於東北的熊希齡感歎京中人不知東北情形，亦不明錦瑗鐵路其要在於抵禦日俄<sup>⑮</sup>。熊希齡此說顯然頗不合情理。滿洲年輕親貴再無能，亦不可能一無所知，所以更有可能的是不願，而非不知。據時任度支部左侍郎紹英1909年8月2日在日記所述：「徐尚書〔徐世昌〕云：至錦洮鐵路須借款興修，但專為保存土地，於興利養路均未有利益也。澤公〔載澤〕云：須問東三省能籌抵款還款之法，始可興辦也。徐尚書：若講有利益之路線，則開海鐵路必能獲利。澤公云：既貴部擔任能還本息，且有利益，始可借款也。徐尚書云：若籌有資本九千餘萬兩，至十年後每年可將得

利千萬撥給貴部，但籌款殊不易耳。」<sup>⑥</sup>可見載澤早知錫良修築該路意圖，雖並無支持之意，但當然也無必阻之心。

載澤的說法，正好折射出此時清廷中樞對於聯合英美資本、抵制日俄東北擴張之策略的不推不就、模稜兩可的態度。而打破清廷中樞這一模糊態度，轉為積極踐行「遠交近攻」外交政策的，則是美國國務卿諾克斯 (Philander C. Knox) 適時提出的「滿洲鐵路中立計劃」。

#### 四 清廷再議「遠交近攻」

1909年3月塔夫脫 (William H. Taft) 成為美國新總統，並任命諾克斯為國務卿，開始推行「金元外交」。於是，1910年1月1日在得知中國有意廢棄《錦璦鐵路草合同》後，美國向清廷表明支持修築錦璦鐵路，且有意協助中國修築和贖回東北鐵路，即「滿洲鐵路中立計劃」。有了美國此一表態，外務部轉為積極支持修築錦璦鐵路。清政府認為此計劃一旦順利進行，「不特中國行政權不致再有障礙，且各國利益既平，則日俄固無從爭雄，英美亦不致壟斷」，從當時的東北情形來看，美國的參與對清廷是再好不過的<sup>⑦</sup>。另外，錫良和時任奉天巡撫程德全的在京代表熊希齡，也積極勸說載澤支持借用美款修築錦璦鐵路，認為「苟使美議能行，滿洲可定」<sup>⑧</sup>。而徐世昌則本來便十分支持此計劃。1月20日，外務部、度支部、郵傳部三部會奏議借英美款修築錦璦鐵路<sup>⑨</sup>。

不過，日本、俄國、法國隨即迭來警告，反對清廷借英美款修築此路，清廷又屬意緩議。錫良、程德全只得請求堅持立場，不與日俄妥協<sup>⑩</sup>。從《鄭孝胥日記》記載可知，此時主緩議者是那桐與梁敦彥<sup>⑪</sup>。清政府的「遠交近攻」外交政策又陷入膠着。平實而論，此時清政府對於修築錦璦鐵路轉為積極，根本上是受到美國主動接觸的影響，尚且很難說清廷中樞具有主動性，這也是為何一經日、俄、法反對，清廷態度便轉為妥協。而5月駐俄公使薩蔭圖電外務部，匯報有日俄議訂密約之傳言，則引起清廷中樞的注意，並逐漸轉變態度<sup>⑫</sup>。

1910年4月，王慕陶提議與德國、美國締結攻守聯盟<sup>⑬</sup>，此建議引起了錫良和程德全的興趣。當時擔任錫良幕僚的鄭孝胥同意聯德主張，但是表示不能放棄聯英：「覆奉天電云：『東方勢力，惟英最強，我能聯英，縱日、俄挾私，亦不能無所忌憚。德在歐勢強，在遠東則遠出英下，為東省計，聯德以備俄則可，以德代英則必不可。司前既有入德款之議，容密探之。司定於四月二十八日赴俄京，借款合同已定，孝先十一日帶呈。』」<sup>⑭</sup>7月7日，錫良奏借德美款修築東北鐵路<sup>⑮</sup>。經此，東三省聯合英、德、美之外交政策，以鐵路修築的形式再次形成。出乎意料的是，美國積極推動的「滿洲鐵路中立計劃」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激起了日俄聯合維持東北特權的決心，日俄兩國開始接近。同月，第二次《日俄協約》訂立。對此專門協謀東北的協約，各國的態度是「美德反對，英贊成，法不甚注意」<sup>⑯</sup>。

同年正當載灃之弟載濤奉命到歐美考察陸軍，隨行的李鴻章之子李經邁極力勸說載濤趁此機會聯絡邦交，以為牽制之計。載濤到達美國時，時任駐美公使張蔭棠特意詢問此行是否有繼唐紹儀赴美的實踐聯美之意<sup>⑥</sup>。張蔭棠認為，以當時俄、日、英、法均有協約的情況，「若不急籌辦法，速與聯絡，恐為歐洲諸國或日本牽率，以去而為同一之舉動，大局不堪問」，遂向軍機處直接建議聯合德美<sup>⑦</sup>。清末曾擔任監察御史的胡思敬指出，當時載濤赴美，張蔭棠賄賂西方報刊，極力宣傳聯合美德好處；載濤不知此事，而誤以為實，歸國後勸言載灃，於是主張聯美的唐紹儀得以再次出任郵傳部尚書<sup>⑧</sup>。

載濤到達德國時，在6月16日收到電諭，「令聘德將，練兵於北徼外，借美國資本，與農工商業。為並交兩國之計」，於是載濤與駐德公使蔭昌商議聯合美德之事。隨後載濤與蔭昌拜訪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得知中方欲結盟之意，告之曰：「貝勒之意，予知之矣。明歲使吾子為亞洲之遊，乃有條目，今未可也。吾國與中國過遠，今日之事，必與美共之乃無患。尤其要者在於內，未有內政不修而可言外交者也。」<sup>⑨</sup>其實，此時威廉二世也正對《日俄協約》感到焦灼，因為這意味着日俄將聯手阻礙東北門戶開放。威廉二世認為要阻止這樣的情況發生：「我們支持美國在中國鐵路借款中的要求是一個好基礎，從該基礎上我們能進一步更顯明地表示我們利益的一致，最後可能在拉上中國的條件之下」，並主動提出要在蔭昌任期屆滿離德之前與其會面，討論中、德、美加強合作的可能<sup>⑩</sup>。

9月，據德國駐華公使雷克司(Count von Rex)匯報，「最近返北京的貝勒載濤的有利報告，及蔭昌關於德國政府對中國友好態度的報告使攝政王希望與德國有更密切的關係。梁先生〔梁敦彥〕的使命據說是為了這個目的服務。他主要任務是促成德國派遣教官協助中國軍事改革。此外，他要請德國政府派一位有經驗的商務人員」<sup>⑪</sup>。是年冬天改任陸軍部大臣的蔭昌同載濤由德返國，路出奉天時，錫良和奉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還請求載濤、蔭昌支持東省向德國訂購軍火計劃，並得到兩人極力贊成<sup>⑫</sup>。

關於雷克司所言「梁先生的使命」一事，是指1910年下半年梁敦彥以生病為託詞赴歐療養，趁機推動聯合美德之事。當時王慕陶也注意到梁敦彥此行，去信詢問汪康年「梁尚書之病假另有深意，確乎？」<sup>⑬</sup>據曹汝霖回憶，「其時政府亦知東省情形危急，擬用遠交近攻政策，以抵制日本。於是派外務大臣梁敦彥使德，郵傳部大臣唐紹儀使美，擬借助外力，以救危局」<sup>⑭</sup>。

德國皇儲威廉(Wilhelm von Preußen)曾有赴東亞考察的計劃，顯然直接關乎中德美聯盟締結，載灃對此亦十分重視。9月22日載灃在日記記道：「予致德皇電，邀請德太子，旋接德皇謝電。」12月17日又記：「七弟〔載濤〕來府，查勘閑園工程。預備明春邀請德儲在園中晚餐、觀劇事宜，面談一切。」可惜後來東北爆發鼠疫，德儲取消東行，1911年2月1日記：「總因東方鼠疫之故」，「駐德梁使來電，駐京德雷使來電，均言德國皇太子今春不來我邦矣」<sup>⑮</sup>。奉派招待德儲來華的外務部右丞施肇基也回憶道，「籌辦招待德國太子事尚未辦完，而東三省瘟疫事起，德太子取消訪華之行」<sup>⑯</sup>。

從上文介紹來看，1910年下半年後載灃展現了積極聯德的一面。載灃赴歐歸來，也進一步推動了載灃的聯盟策略，當時國內輿論報刊亦有聯合美、德、奧建議<sup>⑥</sup>。梁敦彥在9月到達德國之後，又前往美國，但可惜的是，直至1911年春，依舊未能實現與兩國締結聯盟。隨着西方列強逐步形成以英、法、俄為主的協約國陣營和德、奧為主的同盟國陣營，德國逐漸轉變態度，轉為爭取日本輿論好感，以免日本倒向協約國，對中德美聯盟開始轉向消極<sup>⑦</sup>。不久德儲來華一事也因鼠疫中止，第二次中德美聯盟計劃亦不了了之。

雖然中國未能實現與德國、美國締結攻守聯盟，但是聯美行動卻未有止步。不過由於美國奉行孤立政策，無意干涉歐洲各國的對華、對日外交，中美合作只限於商業、教育等領域。1910年9月23日清政府正式向美國政府要求借款，以實現幣制改革。10月度支部表示希望對美借款，以實現「滿洲實業開發」計劃。清政府提出此請求，既出於渴望借款的目的，也有引進美資以制約已簽訂第二次《日俄協約》的日俄兩國的意圖<sup>⑧</sup>。美國派遣司戴德前往歐洲諸國，請英、法、德三國銀行團參加相關借款，並期待藉此推進錦瓊鐵路計劃復活<sup>⑨</sup>。儘管後來四國銀行借款團變成日俄加入的六國借款團，其對中國借款的壟斷傾向危害到中國主權，但據晚清任職郵傳部、民國後擔任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回憶，第一次幣制改革的借款合同「隱含抵制日本侵吞滿洲的計劃」之意，借款初期仍屬於歐美限制日本借款時期<sup>⑩</sup>。

在第二次《日俄協約》訂立前後，中國國內既有些聲音主張為應對日俄關係緩和、日本離間中俄關係的行為，以及根據「日本滅韓，俄最惡之」的推斷，建議採取聯俄政策；也有繼續主張針對「日英法聯合」而聯合德國者<sup>⑪</sup>。然而在1911年春，輿論開始流傳着俄、德、日聯盟的風說<sup>⑫</sup>。隨着德國改變外交政策，加上日俄意欲瓜分東北的計劃昭然若揭，清廷被孤立的外交局勢日益惡化。到了7月13日第三次《日英同盟》訂立時，晚清外交局勢急轉直下，日本及其盟友包圍中國之局面已然形成。

從上所見，清政府後期的兩次聯盟嘗試均採取「遠交近攻」方策，但都遭遇了挫折，不但未能藉外交勝利重振聲望，反而導致清廷形象在國內外每況愈下。隨後在外交危局與內政動盪交互影響下，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而民國初期再次成為中國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袁世凱，則吸取了「遠交近攻」策略的失敗經驗，開始探索「近交」等其他聯盟策略，隨即走上聯日道路<sup>⑬</sup>。

## 五 結論

日俄戰爭結束後，借鑒以往聯盟政策的失敗經驗，清政府對「聯與國」問題採取了較為消極的態度。1907年《日法協約》簽訂，引起清政府要員及駐外使臣的擔憂，各方紛紛思考中國與西方列強聯盟的可能性。1908年以袁世凱為中心的「聯德美制日」政策正式出台。唐紹儀以專使及考察財政大臣名義前往歐美，推行聯盟外交，即第一次中德美聯盟計劃。可惜的是，由於日美先達成協定、慈禧去世以及袁世凱被罷，唐紹儀失去了清廷強有力的支援，第

一次中德美聯盟受挫。其後載灃攝政，鑒於之前聯合德美政策的失敗，攝政初期在聯合德美與聯日之間彷徨。及後在得到德國、美國較為積極的示好後，載灃開始認真考慮聯合德美問題，但第二次中德美聯盟計劃因日本積極強化與英、俄的聯盟關係，日德關係有效緩和，以及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政府統治搖搖欲墜等內外原因，最終亦未能取得成功。

日俄戰爭後兩次失敗的聯盟外交實踐，是否有更深層次的意義？應該如何理解？事實上，無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中德美聯盟計劃，清政府聯盟政策的一個重要指向都是制約日俄。促使清政府決心推進聯合德美政策的兩個重要條約分別是1907年的《日法協約》與1910年第二次《日俄協約》。《日法協約》的訂立背景，與《日英同盟》的簽訂有關。清政府意識到，如果再不主動採取聯盟外交，中國將陷入以日俄為中心「合而謀我」的孤立局面。隨着第一次中德美聯盟計劃失敗，1909年日美「羅脫—高平協定」達成，清政府在外交上日益孤立。第二次《日俄協約》訂立後，為了防止外交局勢進一步惡化，打破日俄對中國的外交包圍，清政府積極抓住德美態度轉變機會，推進第二次中德美聯盟計劃。清政府的聯盟實踐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還是展現了當政者嘗試打破外交包圍的努力，亦呈現了晚清外交的真實困境所在，即國力衰弱導致外交上長期處於弱勢和被動。德美只是為了避免日、英、法壟斷在華利益而支持與中國在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合作，但在外交形勢變動下聯盟計劃隨即無疾而終。

### 註釋

① 〈元老會議二提出セル小村外相日英協約二關スル意見書〉(1901年12月)，載《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四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6)，頁69。

② Michael H.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895-191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威維爾(Charles Vevier)著，張瑋瑛、李丹陽譯：《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李約翰(John G. Reid)著，孫瑞芹、陳澤憲譯：《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小池求：《20世紀初頭の清朝とドイツ：多元的國際環境下の雙方向性》(東京：勁草書房，2015)。

③ 例如Luella J. Hall, "The Abortive German-American-Chinese Entente of 1907-8",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 no. 2 (1929): 219-35; 李永勝：〈1907-1908年中德美聯盟問題研究〉，《世界歷史》，2011年第4期，頁39-47。

④ 參見張守真：《清季東三省的鐵路開放政策(1905-1911)》(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0)；劉冬梅：《晚清政府以東北問題為中心運作的聯美制日政策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吳心伯：《金元外交與列強在中國(1909-191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朱衛斌：《西奧多·羅斯福與中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江振鵬：《奠基金融帝國：美國塔夫脫政府「金元外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鹿島守之助：《日米外交史》(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58)，頁100-21；角田順：《滿州問題と國防方式：明治後期における國防環境の變動》(東京：

原書房，1967），頁411-12；馬場明：《日露戰爭後の日中關係：共存共榮主義の破綻》（東京：原書房，1993），頁82-88等。

- ⑤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882、887、893、889-90；熊希齡：〈條陳外交危迫進呈策見上瞿鴻禨書〉（1906年7月），載周秋光編：《熊希齡集》，第一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217、250。
- ⑥⑧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34-36、50-51；90。
- ⑦ 〈收署吉林將軍達桂電〉（1907年2月14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三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36。
- ⑧ 〈收駐法大臣劉式訓電〉（1907年6月12日、1907年6月13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三冊，頁192-93。
- ⑨ 〈收駐法大臣劉式訓電〉（1907年6月19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三冊，頁201；又詳見〈使法劉式訓致外部法日協約似有干涉我邊務意電〉（1907年6月19日），載王彥威纂輯，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第三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3130-31。
- ⑩ 〈收駐比大臣李盛鐸電〉（1907年7月21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三冊，頁257。
- ⑪ 《日法協約》簽訂前日本與法國、俄國、英國的協商文件，參見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十卷第一冊（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60），頁47-84。
- ⑫ 〈日本和法國關於亞洲的協定〉（1907年6月10日），載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872-191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頁310-11；又參見〈日佛協商ノ件〉（1907年6月），載《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十卷第一冊，頁81-82。
- ⑬ 汪康年：〈日法協約之深意警告政府〉（1907年7月16日），載《汪康年文集》，上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頁144-46。
- ⑭ 〈發北洋大臣袁世凱、南洋大臣端方、鄂督張之洞電〉（1907年7月29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三冊，頁269。
- ⑮ 〈收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奉天巡撫唐紹儀電〉（1907年7月29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三冊，頁269。
- ⑯ 〈收兩江總督端方電〉（1907年8月14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三冊，頁307-308。
- ⑰ 鄭孝胥著，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102、1131。
- ⑱ 〈收駐德大臣孫寶琦電〉（1908年1月12日、1908年1月25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四冊，頁206-207、229。
- ⑲⑳ 〈收駐法大臣劉式訓電〉（1908年8月22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四冊，頁546。
- ㉑ 船津辰一郎：〈米清同盟首唱者李心靈經歷二關スル件〉（1908年11月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www.jacar.go.jp，B08090204200，「義和團事件ノ賠償金減額ニ對シ清國ヨリ米國ヘ謝禮使派遣一件」（分割3），頁281-82。
- ㉒ 〈收粵督張人駿電〉（1908年8月27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四冊，頁558。
- ㉓ 袁世凱：〈恭錄上諭通飭照常貿易美貨札〉（1905年9月8日），載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十四卷（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頁95；張存武：《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68。
- ㉔ 袁世凱：〈與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F·米拉德的談話〉（1908年4月20日），載《袁世凱全集》，第十七卷，頁467-68。

- ②⑤ 袁世凱：〈在總統府招待全體參議員茶話會上之演說〉（1912年9月2日），載《袁世凱全集》，第二十卷，頁216-17。
- ②⑥ 袁世凱：〈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等談論外交結盟事宜〉（1913年4月7日），載《袁世凱全集》，第二十二卷，頁186-87。
- ②⑦ Michael H.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114-15, 128-29.
- ②⑧ 柳和城編著：《葉景葵年譜長編》，上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頁105。
- ②⑨ 徐世昌：《徐世昌日記》，第二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頁174。
- ③⑩ 〈軍機處寄唐紹儀片單〉（1908年7月20日），載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唐紹儀中文檔案》，第十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頁5926-30。
- ③⑪ 林曉萍：〈晚清「聯美制日」實踐與日本應對——以唐紹儀訪美為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第十二屆青年學者論壇「其命維新：百年清史研究再出發」，2022年4月9至10日。
- ③⑫ 〈江蘇候補道鄭世璜等為營口地方應辦各事呈唐紹儀條陳〉（1907年）、〈營口、遼陽等處稅捐商務情形節略〉（1907年），載《上海圖書館藏唐紹儀中文檔案》，第十冊，頁4483-4513。
- ③⑬ 〈外交交涉事宜條陳〉（1908年），載《上海圖書館藏唐紹儀中文檔案》，第十四冊，頁6600-10。
- ③⑭ 〈鍾文耀致梁士詒函〉（1910年10月31日），載《上海圖書館藏唐紹儀中文檔案》，第十七冊，頁8482-86。
- ③⑮ 阿部守太郎：〈唐紹儀ノ外遊二關スル件〉（1908年9月24日），JACAR，B08090204100，「義和團事件ノ賠償金減額二對シ清國ヨリ米國ヘ謝禮使派遣一件」（分割2），頁159。
- ③⑯ 〈徐世昌就赴旅大與日人大島等交談情況上外務部函〉（1908年9月中旬），載林開明等編：《北洋軍閥史料·徐世昌卷》，第四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頁406-10。
- ③⑰ 清末中國政府欲聯合美德一事，又見佐證於劉體智的《異辭錄》。參見劉體智：〈袁世凱獻遠交之策〉，載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218。
- ③⑱⑲ 《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一冊，頁125-26；1005；143。
- ③⑳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30 November 1908),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30 November 1908),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ember 8, 1908*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2), 510-12.
- ④① 張之洞：〈致外務部〉（1907年8月9日），載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十一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頁363-64。
- ④② “Theodore Roosevelt to William Howard Taft” (22 December 1910), in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ol. VII, ed. Elting E. Mori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89-92.
- ④③ 崔志海：〈攝政王載灃驅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頁22-36；李永勝：〈攝政王載灃罷免袁世凱事件新論〉，《歷史研究》，2013年第2期，頁65-81。
- ④④ 〈細谷資氏ヨリ西園寺公望宛〉（1907年11月30日）、〈後藤新平ヨリ西園寺公望宛〉（1907年1月20日），載山崎有恆·西園寺公望關係文書研究會編著：《西園寺公望關係文書》（京都：松香堂書店，2012），頁58、114。
- ④⑤ 〈桂太郎ヨリ伊藤博文宛〉（1909年1月12日），載千葉功編：《桂太郎發書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頁67。
- ④⑥ 〈清國外交ノ危機愈迫ル〉（1909年10月31日），載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十二卷第一冊（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61），頁207。

- ④⑤ 徐世昌：〈上監國攝政王條議〉，載《退耕堂政書》，第四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1797。
- ④⑥ 顏惠慶著，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1908-1919）》，第一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頁61。
- ④⑨ 《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一冊，頁1005。關於美艦訪問廈門情況，可參見戴海斌：〈也說1908年美國大白艦隊訪問廈門——為馬幼垣先生補充〉，《史林》，2013年第6期，頁96-111。
- ⑤⑩ 鄭毅、李少鵬：〈中日「間島交涉」後期日本外交策略析論〉，《東疆學刊》，2019年第2期，頁1-7。
- ⑤⑪⑫ 愛新覺羅·載灃：《醇親王載灃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頁335；366、377、388。
- ⑤⑬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頁638。
- ⑤⑭⑮ 張守真：《清季東三省的鐵路開放政策（1905-1911）》，頁117；99-105。
- ⑤⑯ 〈使日胡惟德致外部日因東事失歡各國現極力彌縫宜留意電〉（1909年6月30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440。
- ⑤⑰ 〈使比李盛鐸致外部密陳日俄經營滿蒙情形函〉（1909年7月7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444。
- ⑤⑱ 〈使義錢恂奏外交應付宜合各國而統籌全局謹陳各國外交情形摺〉（1909年10月28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594-95。
- ⑤⑲ 鳳岡及門弟子編：《梁士詒年譜》，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頁83-84。
- ⑤⑳ 錫良：〈請敕部籌修東省鐵路片〉（1909年6月8日），載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奏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893。
- ⑤㉑ 〈陳昭常致梁敦彥函〉（1909年7月15日），載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34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頁199-231。
- ⑤㉒ 〈東督錫良奏遵旨籌商東省事宜請敕合力通籌摺〉（1909年5月9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407。
- ⑤㉓ 錫良：〈請撥款開設銀行摺〉（1909年6月8日）、〈請敕部籌修東省鐵路片〉（1909年6月8日），載《錫良遺稿·奏稿》，頁890-91、893-94。
- ⑤㉔ 〈黑撫周樹模致外部請修築錦瓊鐵路之齊墨一段函〉（1909年8月1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483。
- ⑤㉕ 錫良：〈舊病復發籲請開缺摺〉（1909年9月6日），載《錫良遺稿·奏稿》，頁950-51。
- ⑤㉖ 錫良：〈籌借外債議築鐵路摺（草合同一件）〉（1909年10月2日），載《錫良遺稿·奏稿》，頁960-62。
- ⑤㉗ 〈外度郵三部奏東省借款築路事關重大遵旨統籌全局摺〉（1909年11月24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610。
- ⑤㉘ 錫良：〈籌借外款遵照部議妥籌辦法摺〉（1909年12月12日）、〈密陳借款修築錦瓊鐵路片〉（1909年12月12日），載《錫良遺稿·奏稿》，頁1006、1008-1009。
- ⑤㉙ 熊希齡：〈為摺稿事致奉天交涉司鄧司使電〉（1909年11月16日）、〈為商東省有籌選把握之議致奉天交涉司鄧司使電〉（1909年11月17日）、〈為錦齊路事致奉天交涉司鄧司使電〉（1909年11月25日）、〈為錦齊路事致奉天交涉司鄧司使電〉（1909年11月27日），載《熊希齡集》，第一冊，頁579-80、585。
- ⑤㉚ 紹英著，張劍整理：《紹英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140-41。
- ⑤㉛ 〈美署使費致外部東省收回路權以錦瓊路為基礎照會電〉（1910年1月1日）、〈外部致度郵兩部美外部謂保全中國東省鐵路主權須先贖回錦瓊路希詳覆函〉（1910年1月12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634、3649。
- ⑤㉜ 熊希齡：〈請速與美議妥錦兆鐵路合同以防日本上澤公爺書〉（1910年），載《熊希齡集》，第二冊，頁281。
- ⑤㉝ 〈外度郵三部會奏議覆借英美款與築錦瓊鐵路摺〉（1910年1月20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656-57。

- ⑬ 〈日俄法使致外部借美款建築錦瓊鐵路事務請慎重照會 附照會八件〉(1910年)、〈外部覆錫良等錦瓊路事關係重大希飭司緩議電〉(1910年3月14日)、〈錫良程德全覆外部錦瓊路事日俄抗議乞主持電〉(1910年3月15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662-64、3683。
- ⑭⑰ 鄭孝胥：《鄭孝胥日記》，第三冊，頁1246；1250-51。
- ⑱ 〈使俄薩蔭圖致外部報載日俄有議訂密約之說電〉(1910年5月7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701-3702。
- ⑲ 熊希齡：〈就《吉林日報》登載錦愛鐵路問題事致王慕陶函〉(1910年4月17日)，載《熊希齡集》，第二冊，頁48-49。
- ⑳ 〈東督錫良致樞垣俄人脅制中國請提前議定錦瓊張恰二路電〉(1910年7月7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728。
- ㉑ 〈使俄薩蔭圖致外部俄日協約經營滿洲有進無退請整頓內治電〉(1910年7月13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731。
- ㉒ 劉體智：〈載濤考察各國陸軍之役〉，載《異辭錄》，頁224-25。唐紹儀與張蔭棠關係十分密切。參見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61。
- ㉓ 〈收出使美國大臣張蔭棠電〉(1910年8月19日)，載《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第三十二冊，頁426。
- ㉔ 胡思敬：《國聞備乘》(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26。
- ㉕ 劉體智：〈載濤考察各國陸軍之役〉，頁226。
- ㉖ 〈皇帝侍從參事屈樂爾公使致帝國首相柏特曼何爾味電自稿〉(1910年7月13日)，載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頁159。
- ㉗ 〈帝國首相柏特曼何爾味奏威廉二世公文〉(1910年9月28日)，載《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三卷，頁163。
- ㉘ 吳景濂：《吳景濂自述年譜(摘錄)》，收入孫家紅編：《清末立憲運動史料叢刊》，第十五冊，〈奉天諮議局〉，下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頁975。
- ㉙ 施肇基、金問泗：《施肇基早年回憶錄：外交工作的回憶》(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52。
- ㉚ 〈論資政院應提之議案〉(1910年10月17日)，載牛貫傑編：《清末立憲運動史料叢刊》，第十二冊，〈資政院〉，下卷，頁1019。
- ㉛ 具體詳細過程可參見李約翰：《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第八至十章。
- ㉜ 孫毓棠：〈幣制實業借款1903-1911：幣制實業借款的淵源〉，載《抗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32-33。
- ㉝ 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326-27。
- ㉞ 葉恭綽：〈太平洋會議與梁士詒〉，載葉恭綽著，王衛星整理：《葉恭綽全集》，中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頁1020。
- ㉟ 熊希齡：〈請在聯俄交涉期間勿載俄人事迹致各報主筆函〉(1910年)，載《熊希齡集》，第二冊，頁298；惲毓鼎：〈外憂日迫亟宜節蓄財用注重軍事外交以濟艱難摺〉(1910年10月13日)，載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奏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頁119。
- ㊱ 〈外部致汪大燮報載俄德日三國聯盟希探覆電〉(1911年1月18日)、〈使日汪大燮覆外部俄德新有協約德日交情漸親電〉(1911年1月19日)，載《清季外交史料》，第四冊，頁3812、3819。
- ㊲ 林曉萍：〈同牀異夢：袁世凱政府初期的「聯日」嘗試與失敗〉，廈門大學—東京大學研究生論壇，2023年4月30日。